

# 诗歌的个人化与去个人化： 评《T. S. 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

黄 强

**内容提要：**艾略特以诗歌的“非个人化”理论著称，这似乎暗示他的诗歌与他的个人生活无关。但是著名传记作家、文学评论家林德尔·戈登在《T. S. 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一书中，通过详细梳理与艾略特相关的文献及其朋友、同事和亲人的证言，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角度审视了这位20世纪伟大诗人的一生，特别是他复杂的感情生活，使广大读者和研究者能够将艾略特的传记信息与其文学作品进行更为细致的比照，认识一位感情更加丰富和矛盾的艾略特，以及这些情感是如何投射在艾略特的诗歌作品中。该书对于全球范围内的艾略特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林德尔·戈登；T. S. 艾略特；情感；传记

**作者简介：**黄强，兰卡斯特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项目基金：**本文系2019年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托·斯·艾略特文学作品中的战争书写研究”（19WXC010）阶段性成果。

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的《T. S. 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The Imperfect Life of T. S. Eliot*）一书于1998年首次出版。该书是戈登根据其早年撰写的两部T. S. 艾略特（T. S. Eliot）传记——《早年艾略特》（*Eliot's Early Years*）和《艾略特的新生》（*Eliot's New Life*）——整理和改写而成。这两本分别从艾略特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经历入手，细致勾画了艾略特的生活细节，展示了其生活和写作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这两册传记的基础上，作者在《T. S. 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中补充了一定数量的新资料，包括艾略特的书信、手稿、散文文章等，为当代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去审视这位伟大诗人的一生，将艾略特的传记信息与其文学作品进行更为细致的比照，认识一位感情更加丰富和矛盾的艾略特，对艾略特以及他的作品产生更加全面和感同身受的理解，特别是他

所遇到的困境和内心的矛盾，以及这些情感是如何投射在艾略特诗歌作品中的。凡此种种，对于全球范围内的艾略特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该书一直是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国内外艾略特研究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2019 年，许小凡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出版。

该书之所以能够在出版后成为国内外艾略特研究的一本主要参考资料，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准确把握住了艾略特的写作和他的生活间存在着的一种复杂的、若即若离的联系。正如戈登所说：

艾略特希望成为“通过强烈的个人经验传达普遍真理的那一类诗人”。在一定程度上，他的作品的确保留了个人经历的“一切特殊性”，尽管要从作品回顾他的生活就只能借由想象的再创造，或《荒原》(*The Waste Land*)手稿中弃用的残篇，或最具自白性的剧作《家庭团聚》(*The Family Reunion*)的十个创作阶段。这个过程的主要困难，在于洞察诗人生活与作品间的联系，以使他主要作品的伟大之处得到彰显，因为这些作品同时也是诗人生活里最重要的现实。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脑海里描绘出一个对不朽充满渴望的人，并重构他借以通向不朽的谋略。在这非凡的谋略里，献身出于自愿，疑虑常获指引，专注又矢志不移；那一以贯之的纯粹轨迹于是浮现于我们面前——在这纯粹背后，则是几段因此而破碎的生活。(戈登，2019)<sup>4</sup>

在艾略特的诗歌作品中，读者不难发现许多来源于诗人生活的文学性投射。例如，在《荒原》中，兜揣葡萄干的斯米纳(Smyrna)商人意象被普遍认为反映了艾略特在 1917 年至 1925 年间在英国劳埃德(Lloyds)银行的工作经历；在《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的开篇《燃烧的诺顿》(“Burnt Norton”)中，那个干涸的水池意象也是源自艾略特的一次真实出游经历。在艾略特的诗歌中，此类例子比比皆是。虽然我们清楚地知晓艾略特的诗歌作品绝非是对其生活的机械性复述，但不可否认的是，艾略特的诗歌又与他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正如戈登所指出的一样，“艾略特在他的诗里最为坦诚”，但“这份坦诚总受到著名的去个人化理论(impersonality)的掩护”(戈登，2019)<sup>6</sup>。读者们不难在艾略特的作品中窥见这类掩护。“变换的面孔”和“嘈杂的声音”(戈登，2019)<sup>6</sup>都试图将读者的注意力固定在艾略特的诗歌作品上，使他们不要轻易将艾略特的文字与他的生活结合。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刻意的掩饰似乎也暗示了诗人的一种自觉、补救和自我抑制。正如戈登所说，“艾略特诗歌里这些‘去个人化’

外壳之下隐藏的，往往是对他个人经历的如实重构”（戈登，2019）<sup>6</sup>。而戈登的书则很细致地重构了这一层关系，将艾略特的“面具”（戈登，2019）<sup>3</sup> 摘下，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更真实的艾略特。

戈登的《T. S. 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一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它为艾略特的读者和研究者详细地梳理了艾略特的感情生活。这不仅仅是戈登有意而为之，同时也是因为艾略特的感情生活是其生命中举足轻重、不可不提的一个组成部分，常常在他的诗歌和戏剧作品中若隐若现。艾略特的感情生活中交织着对几位女性的爱恨情仇。而对于女性，我们不得不承认她们对于艾略特而言，是一个矛盾的对象。首先，艾略特在他的文学创作、手稿和书信中，对女性和女性人物都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关注。如同被画廊中谈论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女性人物所吸引的普鲁弗洛克（Prufrock）一样，艾略特的注意力也被各类女性角色深深地吸引。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随处可见，例如，《一位女士的画像》（“Portrait of a Lady”）中的怨妇、《南希表妹》（“Cousin Nancy”）中的南希、《哭泣的姑娘》（“La Figlia che Piange”）中的长发少女、《荒原》中的玛丽（Marie）等。这也使得女性人物成为艾略特作品中一类重要的文学意象。这个现象出现的成因很多。首先，它和艾略特的性格与身体健康状况有着一定关系。艾略特性格内向，在与女性友人的交往中往往保持着高度的克制与矜持。直到艾略特的晚年时期，待他再婚之后，这一特质才逐渐褪去。此外，他自小身患双层网膜疝气，需要穿着特制的束腹带，无法参与剧烈运动，婚姻生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读者不难觉察出一种对于女性的复杂欲望。这种欲望有时表现为一种对于爱的渴望，有时表现为一种试图亲近女性却又唯唯诺诺的犹豫不决，有时还表现为一种对于女性的病态暴力倾向。此外，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关注”女性是当时许多作家的普遍做法。这种对于女性的“关注”也可以在艾略特的诗歌作品中看到。在《勇敢的对话》（“Conversation Galante”）中，艾略特也写过诸如“你，女士，是永恒的说笑者 / 纯粹的永恒敌人”（Eliot, 1969）<sup>33</sup> 的诗句。这类诗句的出现和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许多男性作家都意识到了女性作家和女性读者群体的日益壮大，并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屑。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在读本科时就希望运用荷马（Homer）、但丁（Dante）和其他经典男性作家去抵抗诗歌创作和阅读赏析日益女性化的趋势。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也曾在他的笔记本中写道：艾略特的《荒原》终结了诗歌归属于女性的幼稚想法。史蒂文斯和乔伊斯只是这个庞大男性群体中的两个个例。这些作家一方面担忧自己作品的市场份额和销售情况会受到新兴女作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担心现代英文创作和现代社会的女性化会导

致审美趣味的平庸化。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复杂情绪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与艾略特自身的生活境遇和感情纠葛息息相关。这完全可以从戈登的书看出一些端倪。戈登的书对艾略特的感情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梳理，先后讲述了艾略特与其母亲、艾米莉·黑尔（Emily Hale）、第一任妻子薇薇恩（Vivienne）、玛丽·特里维廉（Mary Trevelyan）以及第二任妻子瓦莱丽·弗莱彻（Valery Fletcher）之间的故事。首先，作为家中的幼子，艾略特从出生开始就受到了家人的格外关注，特别是他的母亲。艾略特的母亲青年时期也曾想致力于诗歌创作，但最终出于家庭等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因此，她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艾略特的身上。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她似乎希望艾略特能够成为她诗歌梦想的一种延续。虽然艾略特后来所取得的成就算是很好地完成了他母亲的愿望，但对母亲的关爱和期待，从艾略特的文字中，我们似乎还是可以觉察出一丝焦虑和抵触。这种焦虑和抵触的产生并非是因为艾略特不爱他的母亲，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主体性自发地排斥了一些外在的钳制和压抑。在这个过程中，一位权威的母亲在艾略特的诗歌作品中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而这种权威母亲角色在艾略特作品中的缺席也许也验证了艾略特对于母亲的关注和刻意回避。与艾略特的母亲不同，艾米莉·黑尔的出现对于艾略特的生活和创作都带来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艾略特与艾米莉相识于大学的戏剧社团。在几次戏剧表演合作后，内向的艾略特逐渐对艾米莉产生了好感，而艾米莉也“从此成为艾略特诗中一系列花园意象的缘起”，而“这些花园代表了他对一个女孩浪漫的倾慕”（戈登，2019）<sup>84</sup>。在艾略特的一生中，他和艾米莉共有多达 2,000 多封的书信来往。这个庞大的数字意味着，在他们交往的 30 年间，大约每一至两周就会有一次书信往来。其频率之频繁，让许多艾略特的读者和研究者咋舌。虽然艾米莉希望艾略特将她写的书信保留下来，捐赠给牛津大学的饱蠹楼（Bodleian）图书馆，但是艾略特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中还是委托当时费伯出版社的经理彼得·杜·索托伊（Peter du Sautoy）将他所保存的 1,000 多封由艾米莉所写的信函尽数焚毁，理由是为了“保护”艾米莉（戈登，2019）<sup>400</sup>。但是，让人庆幸的是，艾米莉所持有的那 1,000 余封由艾略特所写的信函被保留了下来，目前由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珍藏，并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正式解禁。广大读者也终于可以第一次阅读二人之间的信件往来，了解那一段不为人所熟知的往事。正如戈登书中的记叙所示，艾略特对于艾米莉的感情是复杂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艾略特的诗歌文字中来看，艾略特对其从青年时期“偶尔闪现的性冲动和与之相连的负罪感”（戈登，2019）<sup>87</sup> 逐步转变为后期的一种柏拉图式的向往和迷恋。正

如戈登所说：

在艾米莉·黑尔的身上，艾略特寄托了非同一般的厚望，他希望她的爱能契合他自身的需求，将小写的爱转化为大写的“爱”——经过提纯而永不蒸发的凝露。（戈登，2019）<sup>349</sup>

两人似乎都意识到了他们之间存有的那一份特殊感情，但是，由于艾略特的已婚状态和他的宗教信仰坚持，他们都未曾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而是默默地将那一份矛盾的心仪停留在了书信文字上。而艾略特的第一任妻子“薇薇恩和艾米莉·黑尔的故事”则“像地狱和天堂”的“两个极端”（戈登，2019）<sup>405</sup>。艾略特与薇薇恩相识于1915年的牛津，他们在一个舞会上初次见面。当时，热情活泼的薇薇恩给身处异乡的青年艾略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短暂的接触之后，两人在英国闪婚。个中缘由，众说纷纭。但是，不论艾略特缘何做出闪婚的决定，他和薇薇恩的这段婚姻都是不和谐的。成婚后不久，本就身患隐疾的艾略特陷入了经济危机。他不得不开始为各种期刊撰写书评和评论文章，同时为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夜校课程代课，以赚取足够的稿费和课酬，支持家庭开支。同时，薇薇恩的身体健康状况也不理想：她身患妇科疾病，随后精神状态也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这使得两人在婚后的生活中都十分痛苦和无奈。久而久之，艾略特对这段婚姻的认识由最初的激情澎湃转变为深深的悔恨自省。他悔恨的原因固然包括了对于过早迎娶薇薇恩而产生的悔恨，但笔者认为他的悔恨同时也包括了对薇薇恩后期悲惨孤独生活的遗憾。这种掺杂着愧疚的悔恨感使得艾略特在他和薇薇恩成婚多年后就开始分居。更准确地说，这种分居是艾略特对薇薇恩的刻意回避。可是，当薇薇恩在孤独中去世后，艾略特似乎也对人世间的情爱失去了热情。这种转变可以从他与玛丽·特里维廉的交往中看出。在1938年至1956年间，艾略特与玛丽维持着一段“公开的友谊”（戈登，2019）<sup>401</sup>。他俩经常结伴去教堂，也一起参加聚会和观看演出。玛丽俨然成了艾略特这个时期“最亲密的朋友”（戈登，2019）<sup>445</sup>。根据戈登的描述：

与艾米莉不同，玛丽·特里维廉总是艾略特身边形影不离的随从。他们的友谊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考验阶段；战时和战后的通信阶段；以及目前这个为期较长的阶段——玛丽主动出击，他一边回避一边又益发依赖她的守护。（戈登，2019）<sup>473</sup>

面对玛丽的几次主动求婚，艾略特都报以婉拒，但是，艾略特的几次婉拒并

没使玛丽对于艾略特的爱降温。而真正使玛丽对艾略特心灰意冷的是艾略特的第二次婚姻。1957年，艾略特与他在费伯出版社的秘书瓦莱丽·弗莱彻成婚。这对老夫少妻的结合一时成为许多人谈论的话题。但是，如果以一个回溯的观点审视艾略特的第二段婚姻，我们不得不说艾略特从他年轻的妻子处体会到了婚姻的美好和爱的幸福。这一份幸福感可以在艾略特的晚期作品中得见一二。

总的来说，我们必须承认，这本传记详细而严谨地复原了艾略特的生平并展现其生平与作品的关系，使读者对艾略特的这一段历史有了详细的了解和深刻的体会。但是，这本书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个历史时期所特有的局限。虽然戈登的书依次对艾略特的童年和故乡回忆、求学经历和文学启蒙、创作生涯的形成和发展、信仰的变化情况、编辑工作和文化批评、戏剧编写和散文写作等生命历程娓娓道来，但是她收集和考据的参考资料还是有很大的缺陷，例如，戈登几乎没有提及艾略特的散文创作，同时在描写艾略特晚年生活时未能像描述艾略特青年时期那样细致入微。罗纳德·舒哈（Ronald Schuchard）在2017年7月9日第九届T. S. 艾略特国际暑期学校开幕式上做过一次名为《〈T. S. 艾略特散文全集〉和〈T. S. 艾略特书信集〉简报》（“Brief report on the *The Complete Prose of T. S. Eliot and The Letters of T. S. Eliot*”）的报告（Schuchard, 2017）。作为艾略特散文集的总主编，他在报告中提及，大约90%的关于艾略特的已有研究著述没能涵盖艾略特大约90%的作品。虽然，笔者相信戈登的著作属于那少数的10%，但是，考虑到艾略特部分作品、信件、散文和手稿的版权保护期，戈登的著作还是忽略了很多与艾略特相关的材料。戈登本人似乎也很委婉地在《T. S. 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的前言中承认了这一点：该书的出版本身就是她通过考证新材料后对她之前出版的两本书做出的修正和补充（戈登，2019）<sup>2</sup>。但是，随着近几年艾略特书信、散文、诗集、传记的相继出版，艾略特的文学作品和其生平之间的联系愈加清晰。此类出版物包括了由瓦莱丽·弗莱彻、约翰·哈丰登（John Haffenden）、休·霍顿（Hugh Haughton）主编的艾略特书信集，目前该系列书籍已经由费伯-费伯出版社出至第八卷，且以大约每年一本的速度持续出版。另一套比较有代表性的新材料是八卷本的《艾略特散文集》（*The Complete Prose of T. S. Eliot: The Critical Edition*），该书由舒哈主编，每卷邀请一位或两位国际艾略特研究的专家负责具体的编纂和整理工作。2019年9月，该书的第八卷即最后一卷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在其网络平台“缪斯项目”（Project Muse）上出版。此外，克里斯托弗·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和吉姆·麦秋（Jim McCue）于2015年出版了两卷全新注释版的《艾略特诗歌全集》（*The Poems of T. S. Eliot*），对艾略特诗歌

中的诗行和用词的解释与源头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罗列，为广大艾略特作品的读者和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同年，另一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诗歌教授罗伯特·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撰写的新版艾略特传记《青年艾略特：从圣路易斯到〈荒原〉》（*Young Eliot: From St. Louis to The Waste Land*）。该书由乔纳森·凯普（Jonathan Cape）出版社出版，非常详细地呈现了艾略特的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为全球范围内的艾略特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笔者相信，随着艾略特相关的新材料逐步面世，艾略特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将进入一个新的小高潮。这个小高潮不仅会出现在英美两国和欧洲大陆上，也会出现在诸如中国、印度、韩国等欧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而许小凡的这部译著也许就是这个高潮的前奏。她的译作语言优美、文风简洁，在忠实于原文的同时，也很好地避免了一些难以处理的情况，例如，她在翻译艾略特早期创作的一些粗俗诗歌时，用委婉的语言规避了原文中的争议语言。总而言之，这本书写质量和翻译水平俱佳的译著势必将为未来中国的艾略特研究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使广大的中国读者能够进一步了解艾略特和其充满独特美感的文学作品。

###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CRAWFORD R, 2015. *Young Eliot: from St Louis to The Waste Land* [M]. London: Jonathan Cape.
- ELIOT T, 1969. *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of T. S. Eliot*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 SCHUCHARD R, 2017. "Brief report on The complete prose of T. S. Eliot and the letters of T. S. Eliot." *T. S. Eliot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Little Gidding, England (9).
- 戈登, 2019. *T. S. 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 [M]. 许小凡,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